

驻村第一书记赋能小农户有效参与普惠金融的机制与路径

陈思^a, 杨学儒^b

(华南农业大学 a. 数学与信息学院; b. 经济管理学院, 广东广州 510642)

摘要: 普惠金融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支撑,但是,因产业基础薄弱与内生能力不足,小农户长期面临信贷自我排斥难题。基于能力贫困理论与嵌入性理论,构建了“嵌入-赋能-协同”整合性分析框架,以粤东S市C区驻村第一书记实践为案例,系统阐释其赋能小农户融入普惠金融的机制与路径。研究发现:第一,分阶段构建协同机制,驻村第一书记通过“直接嵌入政策资源-间接构建主体共生网络-三产融合互嵌”的阶段协同机制,动态夯实乡村特色产业基础,破解小农户信贷需求抑制困境;第二,优化多维赋能路径,通过政策工具、生产技术标准化与市场渠道数智化,系统性弥补小农户能力不足,重塑其信贷参与信心与行为逻辑;第三,创新组织利益联结机制,以“风险共担-信用积累”为核心,促进金融工具创新与产业链整合,推动小农户从被动受惠向主动参与转变,实现有效参与普惠金融。据此提出建议:完善适配性普惠金融政策设计,强化金融工具创新;优化驻村第一书记选拔与考核机制,提升其资源整合与数字治理能力;强化党建引领功能发挥,以党建促进整体性融合,推动产业链与金融链融合发展。

关键词: 普惠金融;驻村第一书记;嵌入性治理;有限能力;利益联结

中图分类号: F832.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202(2026)01-0075-15

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①。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指出“千方百计推动农户增收”^②,推动小农户可持续增收是新时期乡村全面振兴的根本要求。扶贫小额信贷等普惠金融产品根植于农村,致力于提升小农户的信贷可得性,助力其借助金融杠杆撬动产业发展以带动持续增收。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末全国人民币贷款余额达237.6万亿元,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2.59万亿元,占贷款总额比例约为5%,表明这一领域依然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34%,较各项贷款增速高10.2个百分点,反映出政策层面对涉农普惠金融的高度重视和推进成效。

收稿日期: 2025-06-04

DOI: 10.7671/j.issn.1672-0202.2026.01.0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3BJY161)

作者简介: 陈思(1986—),男,江苏启东人,华南农业大学数学与信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金融、农村区域发展、党建。E-mail: chensi1005@scau.edu.cn

通讯作者: 杨学儒(1980—),男,四川广安人,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创新创业、农文旅融合与共同富裕。E-mail: yangxueru@scau.edu.cn

①参见《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7/content_6963409.htm。

②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 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2/content_7005158.htm。

然而,小农户有效参与不足仍是制约普惠金融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瓶颈^[1]。现有研究指出,小农户在现代农业生产设备、风险管理和信息获取等方面存在先天缺陷,导致其衔接外部市场的能力有限^[2],无法有效规划和使用信贷资金,造成信贷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抑制了其参与普惠金融的积极性。实践中,小农户将扶贫小额信贷等普惠金融资源直接转贷给企业^①(“户贷企用”)或用于消费的“自我排斥”现象屡见不鲜^[3-4]。因此,如果无法弥补小农户参与市场能力不足的缺陷,仅从供给端单方面加强农村金融市场的流动性,难以有效调动小农户参与普惠金融的积极性。

当前,有关小农户有效参与普惠金融的文献主要有“信贷供给排斥”“小农户的自我排斥”及参与普惠金融的增收效应三个主要方向。

第一,有关小农户遭受信贷供给排斥的研究。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信贷供给排斥是制约小农户有效参与普惠金融的首要障碍。金融机构因风险控制和成本考量,在面向缺乏抵押资产、规范财务记录和信用积累的小农户时,往往采取更为审慎的信贷策略^[5-6]。此外,小农户在数字技术应用等方面存在能力短板,也加剧了其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尤其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小农户有限的信息获取与数字使用能力,使得其与金融机构的交易成本居高不下,“数字鸿沟”使其成为被信贷供给排斥的对象^[7-10]。

第二,有关小农户信贷“自我排斥”的研究。已有文献揭示了小农户因内在能力不足而“自我排斥”的缘由。一方面,源于小农户对金融知识与风险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其对信贷产品普遍缺乏理解和信任,担心还款压力会冲击脆弱的家庭生计,从而产生风险规避行为^[11-13]。另一方面,更为根本的原因是小农户市场参与能力不足。在农业市场化、数字化进程中,小农户分散、传统的生产模式难以适应现代市场对规模化、标准化的高要求,其在信息、技术、产业链议价等方面综合能力的短板,使其难以形成稳定的盈利预期和有效的信贷需求,从而强化了“不敢贷、不愿贷”的自我排斥行为^[14-17]。因此,“自我排斥”本质上是小农户在现代市场体系中“有限能力-风险感知-行为抑制”结构性困境。

第三,有关小农户参与普惠金融的增收效应研究。相关研究结论的分歧也间接指向了“有限能力”的关键作用。部分研究认为,普惠金融能缓解小农户信贷约束以促进生产投入,从而带来收入增长与福利提升^[18-19]。但也有学者指出,若忽视小农户的能力建设,普惠金融的增收效果往往难以持续。在产业基础薄弱的地区,若小农户缺乏将信贷资金转化为有效生产与市场回报的能力,信贷资源可能面临“转贷”或使用效率低下等问题,单纯强化信贷供给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增收机制^[21]。

既有研究虽揭示了小农户因能力与禀赋限制而陷入“自我排斥”及难以分享普惠金融发展红利的困境^[13],并从多维度揭示了信贷排斥成因,但在机制解释与政策可操作性方面仍存在不足,具体表现在:一是多元主体协同机制阐释有待完善。现有研究多强调通过产业基础赋能小农户,而多停留于应然分析,但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间的目标差异与协同摩擦关注不足。实践中,各方行动逻辑各异,政府资源可能错配^[22],企业倾向挤压小农户收益空间^[5],社会组织难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5,23],缺乏对化解协同困境的系统阐释。二是政府直接干预效果的局限。尽管研究强调政府在推动产业与信贷配置中的作用,但“自上而下”的垂直治理易引发供需错位与瞄准偏差^[7,25]。短期资源投入的效果难以持续,政策退出后易导致产业回落^[24],该模式对基础薄弱地区的参考作用有限。三是传统基层治理模式适配性不足。传统村干部受资源与能力限制,在跨层级

① “户贷企用”即建档立卡户将信贷资金直接转贷给企业的行为。国家分别于2020年7月和2021年7月相继颁布沿用至今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扶贫小额信贷管理的通知》和《关于金融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意见》明确规定贷款要用于生产用途,且“户贷、户用、户还”。上述政策的颁布反映了“自我排斥”行为在扶贫小额信贷政策实施过程中依然持续存在。

整合资源、对接市场与推动产业升级方面存在短板,难以在“产业链-普惠金融”关键环节形成有效治理。现有治理研究尚未有效回应农业转型中新生产要素的配置需求,未能构建通过赋能小农户以激活内生动力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综上,既有研究在如何系统性弥补小农户能力不足、构建多主体协同机制,以及创新基层治理路径方面仍存在研究空间,这也为本文探索“驻村第一书记”提供了切入点。

驻村第一书记制度作为中国特色乡村振兴实践的重要制度创新,为破解上述困境提供了潜在的路径。驻村第一书记是指由国家从各级机关、国有企业及事业单位选派至村担任党组织负责人的优秀党员干部,其核心职责在于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推动产业发展及帮扶弱势群体^[26]。既有研究虽明确了驻村第一书记在乡村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但研究较少关注其如何赋能小农户有效参与普惠金融的内在机制与路径。事实上,驻村第一书记具备资源整合者、政策执行者与组织协调者的多重角色,在理论上回应了“多主体协同困境”“政府干预局限性”与“传统治理模式能力不足”等核心问题。因此,系统探讨驻村第一书记赋能机制,对弥补理论缺口、优化普惠金融实践具有重要价值。

本文立足于小农户“有限能力”的现实基础,以粤东S市C区实践为例,探究驻村第一书记赋能小农户参与普惠金融的机制与路径。重点分析其如何依托制度身份整合政府、企业、合作社、高校等多主体,构建利益联结机制以破解协同难题;并通过培育适配性产业体系,弥补小农户能力短板,将外部金融资源转化为内生发展动力。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为:一是理论层面。借鉴阿玛蒂亚·森的能力贫困理论,从“可行能力”剥夺的视角阐释小农户“自我排斥”的根源,为理解其普惠金融参与困境提供新分析框架。二是机制层面。揭示驻村第一书记作为关键行动者在聚合资源、弥合政策断层、链接产业与金融过程中的具体作用,为理解国家“嵌入式治理”赋能基层提供新路径。三是实践层面。以第一书记为枢纽,通过政策、组织、生产与市场等多维赋能,构建与小农户能力匹配的产业金融融合发展路径,为普惠金融精准支农提供参考。

二、政策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 驻村第一书记制度的政策背景

驻村第一书记制度是我国基层治理与精准扶贫的重要制度创新,其政策演进经历了由探索到系统化、常态化的过程。该制度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干部下乡扶贫实践,2015年《关于做好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的通知》的出台,标志着驻村第一书记制度的正式确立,明确了其在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推进精准扶贫等方面的重要职责。进入“十四五”时期,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21年印发《关于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意见》,进一步将驻村第一书记制度纳入乡村振兴战略框架。后续《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和《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等文件持续强调要“派强用好”驻村第一书记,推动其职责从脱贫攻坚向强村富民、提升乡村治理、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等多维拓展,具体包括强化基层组织建设、推动资源下沉、促进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等内容。截至目前,全国累计选派驻村第一书记20.96万名、工作队员56.3万名,成为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推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27]。

(二) 理论基础

1. 嵌入理论下村级治理模式差异对比分析

基于格兰诺维特提出的嵌入理论,经济活动与治理实践均嵌入于特定的社会关系、组织网络与制度环境之中。在中国乡村治理语境下,嵌入理论常被用于分析外部主体如何通过资源、关系与制度层面的嵌入,与乡土社会形成有效互动,进而推动资源整合与能力提升^[28]。从嵌入模式来看,传统村干部主要依托本地社会网络实现嵌入,虽具备一定的本土认同与动员基础,但其治理实

践存在明显局限:一方面,基层组织对外部政策与金融、技术等关键资源的整合能力有限,村庄发展易受制于内生资源条件^[29];另一方面,“内部人”治理易陷入路径依赖,不利于制度创新与多元协作网络构建,也制约了小农户与现代产业链及普惠金融体系的衔接能力。相较而言,驻村第一书记作为一支外部嵌入的治理力量,展现出显著的制度优势(见表1)。其嵌入来源不再局限于本地网络,而是依托上级党政与原单位资源,具备跨层级政策动员与跨系统协调的能力,能够有效引入发展所需的金融、技术、人才等要素,打破村庄封闭格局^[30]。同时,驻村第一书记通常具备较强的现代治理经验与统筹能力,能够协调村、企、社等多方主体,推动资源在“县-乡-村”之间高效流动,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在嵌入方式上,驻村第一书记不仅注重党建引领与制度创新,也着力构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联结机制,为小农户融入产业链与普惠金融体系提供组织保障。相较于传统村干部的“直接行政嵌入”,驻村第一书记更强调“政策资源+协同治理+能力赋能”的系统嵌入方式,注重激发基层自治活力与农户主体性,从而在提升产业发展可持续性的同时,有效增强小农户参与普惠金融加入产业协作的内生动力。

表1 传统村干部、驻村第一书记嵌入模式的对比

嵌入主体	嵌入来源	嵌入场域	嵌入方式	嵌入作用
传统村干部	本地社会网络	村域	引入外部资金等资源	补足乡村产业资源
驻村第一书记	外部政策/组织	村域、企业、合作社、高校、政府等	引入外部主体与资源,激活小农户内生动力	引领、适配、协同、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推动小农户有效参与普惠金融

2. 小农户使用普惠金融的有限能力

当前,农户群体已呈现显著分化特征,资本禀赋差异成为影响其参与普惠金融的关键因素。基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贫困不仅是收入低下,更是获取资源、把握机会与应对风险等方面的“实质自由”缺失^[31]。在此框架下,小农户的资本禀赋直接影响其信贷决策与使用效能。年轻、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更易掌握先进技术并主动参与信贷;物质资本如土地与设备规模正向影响小农户标准化生产能力;社会资本如参与合作社则通过信息共享与风险缓冲,提升小农户信贷信心与经营可持续性^[32]。因此,小农户能否有效利用普惠金融,不仅取决于物质、人力资本存量,更依赖于技术应用、市场对接与风险应对等综合能力。在粤东S市C区狮头鹅特色产业实践中,尽管基础设施改善带来了新的市场机遇,但大多数小农户受限于长期能力积累不足,难以适应产业规模化、品牌化的发展要求,普遍面临“精英俘获”的发展困境。具体而言,小农户的“有限能力”瓶颈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生产技术设备不足。小农户传统散养模式难以满足现代养殖的标准化要求。产业起步阶段小农户多采用本地土法育苗和露天放养,现代化养殖设备普遍匮乏,超过八成的受访农户凭经验养殖,狮头鹅成活率普遍低于70%,养殖周期长达7~8个月,料肉比高达3.5:1,生产效率低下;二是市场接入能力薄弱。早期的小农户因缺乏合作组织,在价格谈判中处于弱势,如C区小农户在早期狮头鹅销售时多依赖中介,溢价空间有限;三是金融素养能力欠缺。小农户对信贷政策、风险管理工具认知不足。访谈中了解到,驻村第一书记派驻前,仅约三成的小农户了解惠农信贷产品,能正确计算融资成本的小农户不足二成,导致其慎贷、惧贷现象普遍,难以借助普惠金融投身产业发展。

(三)“嵌入-赋能-协同”的整合性分析框架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在深入分析驻村第一书记制度实践与乡村普惠金融发展现实的基础上,构建“嵌入-赋能-协同”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该框架系统阐释驻村第一书记如何通过“嵌入”夯实产业基础、通过“赋能”激活小农户能力、通过“协同”整合产业链与金融链,从而系统破解小农户参与普惠金融的“有限能力”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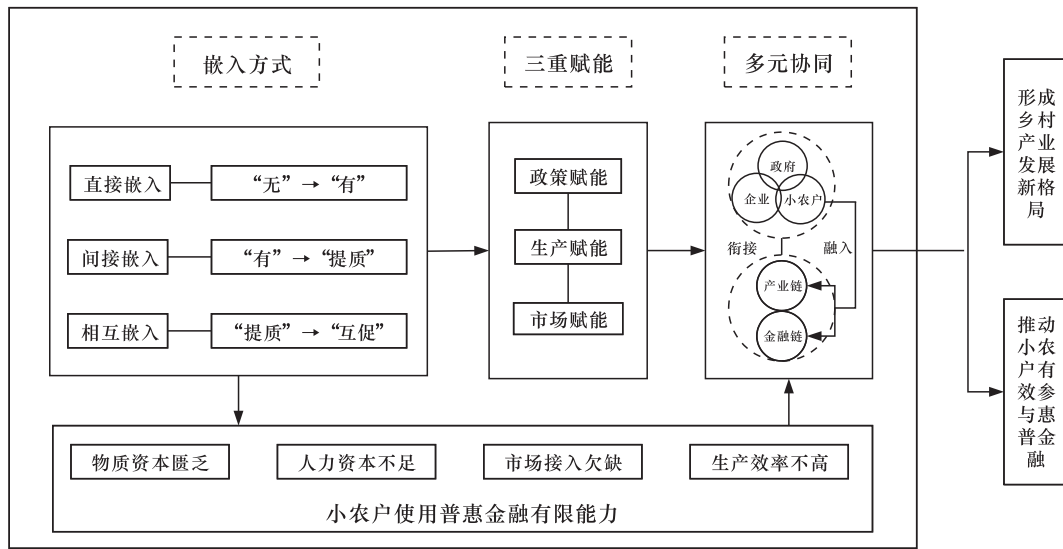


图1 “嵌入—赋能—协同”整合性分析框架

首先,驻村第一书记多维嵌入推动产业升级,夯实小农户普惠金融参与基础。传统模式下,政府部门往往通过财政资源配置及市场主体导入机制,采用行政主导型干预手段推动乡村产业振兴,该模式通常难以有效根植于当地资源禀赋形成在地化的产业发展。政府通过派驻第一书记可以有效规避传统模式下政策驱动型资源配置来推动产业发展的弊端,驻村第一书记秉持“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工作理念,能够更精准地整合外部资源与本地优势,实现政策嵌入、市场机制与农户需求的有机联动,第一阶段为“无→有”的直接嵌入阶段,通过争取资源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各项基本条件。第二阶段为“有→提质”的间接嵌入阶段,通过关系嵌入产业发展各行为主体,同时以结构嵌入产业发展全过程链条,促进“人-财-物”各维度全要素协同推动产业的发展,破解传统模式下政府资源难以持续投入村域产业,以及难以有效激励产业链各主体形成集体行动的问题。第三阶段为“提质→互促”的相互嵌入阶段,驻村第一书记嵌入产业发展各主体和全过程,通过党建引领与资源整合双重机制,构建“一产筑基、二产衔接、三产融合”的产业协同发展模式,在标准化生产、精深加工与三产融合过程中,有效破解传统农业产业发展的结构性瓶颈,促进产业升级与金融供给的良性互动,为推动小农户参与普惠金融奠定外部产业基础。

其次,驻村第一书记赋能小农户,提升其普惠金融参与度。驻村第一书记以“政策赋能-生产赋能-市场赋能”三重赋能机制为核心,着力破解小农户衔接现代市场及普惠金融体系难题。一是在政策赋能方面,供需精准匹配,打通普惠金融政策瓶颈。驻村第一书记主动对接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推动开发契合小农户需求的金融产品。一方面,打造数字化产业平台,实现市场与信贷信息互通,降低金融服务门槛。通过推动品牌认证与地理标志质押等创新金融产品,拓展农户信用资产,创新抵押模式,破解“无抵押、难获贷”难题。另一方面,推动政策性贴息、风险补偿等措施落地,促进金融服务下沉,降低信贷门槛,提升小农户参与普惠金融的积极性和政策实施保障水平,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二是在生产赋能方面,通过主体协同,提高生产组织与效率。一方面,驻村第一书记推动合作社、龙头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多主体协同,强化标准化养殖、技术培训、疫病防控等能力建设,提升农户生产效率和品质。另一方面,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提升议价能力与信用水平,为金融机构提供风险缓释保障,实现组织化发展,强化集体信用背书,为普惠金融提供坚实基础。三是在市场赋能方面,推动协同整合,助力接入外部市场。驻村第一书记依托其独特的跨层级动员和资源整合能力,推动合作社与主流平台、龙头企业建立直供和保

底机制,拓展销售渠道、提升议价能力,增强小农户还款能力和信贷获批率。

最后,驻村第一书记推动各主体联动,打破产业链与金融链的壁垒。乡村主体治理结构对集体经济行动力具有重要影响^[34]。传统模式下小农户难以获得外部有效支撑的原因在于利益联结机制不牢固,主体间都有各自的运行边界,彼此利益难以统一。更重要的是,在政府外部主导下小农户难以嵌入生产链条中,以往的组织联结模式因利益难以协调统一,大多表现得较为松散,小农户难以真正获得企业的有效赋能。为此,驻村第一书记以“社会资本”和“上级政府纽带优势”为抓手,并发挥党建组织融合功能,一方面,引导企业、银行等不同主体与小农户形成牢固的联结模式,塑造延伸产业链条,以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升村域产业发展的效率和效益。另一方面,推动金融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有助于金融机构根据产业链各环节的特点与风险,精准研发匹配的金融产品,以满足企业、金融机构与小农户的多维利益诉求,形成较为牢靠的利益联结模式,提升小农户参与普惠金融的收益可持续性。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协同治理结构下,有效破解传统模式下主体间协同难、农户赋能弱的瓶颈,小农户不仅能获得更精准的普惠金融供给,还能通过产业链分工和利益分配机制更好地抵御外部风险,提升其参与普惠金融的能力与获得感。

三、研究设计

粤东 S 市 C 区政府推动狮头鹅产业发展,引导涉农龙头企业赋能小农户有效参与普惠金融以获得增收的实践经验,对进一步推动普惠金融在乡村有效落地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 案例研究方法

在对比单案例与多案例研究法差异后^[35],本文选取单案例研究基于以下考量:首先,驻村第一书记推动普惠金融落地的过程具有高度情境依赖性与多维复杂性,单案例有助于实现对“政策执行-农户响应-资源协同机制”的深度情境还原与过程追踪。其次,本研究旨在构建“嵌入-赋能-协同”整合性分析框架,并围绕个案展开阶段化、多层次的机制阐释,单案例能够保障叙事一致性与因果链的完整呈现,尤其适用于辨析从驻村第一书记从“直接嵌入”到“三产互嵌”推动小农户有效参与普惠金融的演进路径和特征。再次,案例过程体现出明显的阶段式治理特征,且各阶段均内含“现实动因-干预过程-实践成效”的完整逻辑链,因此纵向单案例研究尤其适用于清晰呈现此类治理路径的演变脉络与内在机制^[36]。

(二) 案例区域选择

本文选取广东省 S 市 C 区狮头鹅产业作为案例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考量。第一,典型性。C 区人均耕地仅约 0.2 亩,农业资源禀赋有限,历史上以小规模分散经营为主。狮头鹅养殖虽具有三百余年历史,却长期面临生产标准化程度低、融资渠道窄、劳动力外流与市场衔接不畅等发展瓶颈。2020 年前,全区规模化养殖率不足 30%,多数农户仍依赖传统养殖经验,与现代金融服务严重脱节。这一现状集中反映了我国众多传统特色农业在现代化转型中的共性困境,具备开展深入个案分析的典型价值。第二,代表性。C 区狮头鹅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不仅是潮汕文化的重要载体,也形成了全国最大的狮头鹅种苗产销基地,种鹅供应量占全国八成以上。以狮头鹅为核心原料的“潮汕卤鹅”享誉全国,已形成覆盖养殖、加工、销售与文化体验的完整产业链,被列为广东省“一村一品”重点产业与区级乡村振兴主导产业。其产业形态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延展性,在乡村特色产业政策实践中具有显著的代表性与示范意义。第三,契合性。狮头鹅产业的发展路径与本文关注的“驻村第一书记-小农户-普惠金融”互动机制高度契合。自 2019 年起,C 区通过派驻第一书记牵头组建产业联盟,推广“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模式,引导金融机构创新“狮头鹅贷”“普惠养殖险”等产品,有效缓解农户资金约束。至 2021 年,该产业全链产值已达 35 亿元,成为联农带农的关键支柱。这一过程为考察驻村第一书记如何通过多维赋能促进小农户融入产业链与金融体系提供了适切的微观样本。

(三) 案例搜集过程

首先,研究团队于2023—2024年间多次赴C区开展实地调研,采用目的性抽样对驻村第一书记、小农户、合作社、企业、政府及金融机构等关键主体进行半结构化访谈,累计访谈60余人次,重点围绕第一书记的嵌入方式、赋能实践、金融协同及农户响应等内容。其次,为追溯产业与金融协同发展的演进脉络,研究系统收集了政策文件、产业规划、合作协议与项目报告等档案资料,并结合与驻村第一书记的正式与非正式访谈,全面把握其通过推动狮头鹅产业振兴以提升小农户金融能力的全过程。最后,研究通过多种方法交叉验证以增强信度与效度。除访谈与档案分析外,团队深入养殖基地、合作社与金融服务点进行参与式观察,记录金融产品落地与赋能实践的具体情况;同时整合政府网站、媒体报道、统计年鉴与行业研究报告等二手资料,对一手信息进行补充与核实。资料整理阶段还对关键受访者开展多轮线上回访,填补信息缺口,最终形成涵盖政策文本、项目档案与实地观察的多源互证材料体系。

四、案例描述

(一) 基本情况

S市C区地处广东潮汕地区,狮头鹅产业作为当地传统主导产业,长期面临养殖规模化水平低、产品附加值不足、小农户对接市场能力弱等问题,导致产业整体效益有限,小农户对普惠金融的需求不足。2015年,C区大力实施驻村第一书记下乡工程,聚焦小农户“融资难、信用弱、风险高”等痛点,推动“产业发展—组织联结—金融创新”协同机制。通过引导企业、合作社与小农户协作,创新金融产品,构建区—镇—村三级联动产业体系,有效提升小农户参与普惠金融的能力。截至2024年底,C区狮头鹅产业产值达4.2亿元,养殖规模居全国首位,带动3500余户农户参与,户均增收超3万元,实现了小农户增收与普惠金融的深度融合。

(二) 狮头鹅产业的发展历程

通过对S市C区狮头鹅产业发展历程的梳理,按时间顺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1. 起步发展阶段(2000年—2010年):产业起步与普惠金融排斥

本阶段狮头鹅产业以小农户分散养殖为主,呈现养殖规模小、技术落后的特点。尽管在政府引导下产业开始从分散经营向规模化养殖转型,并初步规划了养殖区域,但整体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仍有待提升,尚未形成大规模的产业化经营。小农户在此阶段面临显著的普惠金融排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产业链不完善导致市场风险较高。狮头鹅品种杂乱、良种率低,从种鹅繁育到加工销售各环节衔接不够紧密,市场波动直接影响农户收益,金融机构对农户还款能力持谨慎态度;其二,产业规模化程度不足。分散经营模式难以形成集群效应,金融机构更倾向于服务规模经营主体,对小农户设置较高信贷门槛;其三,政策支持体系不完善。缺乏贴息贷款、风险补偿等针对性扶持措施,金融机构缺少足够的风险缓释和政策激励。为此,该阶段小农户因收益不稳且缺乏有效的风险缓释工具,导致金融机构出于风险控制考量,对其授信意愿不高。

2. 转型发展期(2010年—2020年):产业升级与普惠金融嵌入

在政府推动下,本阶段狮头鹅产业逐步实现标准化生产和现代化转型。然而在推广过程中,驻村第一书记发现农户参与面临三重困境:一是市场风险制约,部分农户反映“狮头鹅养出来后卖给谁不清楚”;二是资金门槛限制,有农户表示“鹅苗、饲料和设备投入大,家里没钱投资”;三是劳动力瓶颈,部分返乡农户表示“现在年龄大无法外出务工,想参与养殖但体力跟不上重农活”。

面对这些难题,驻村第一书记从化解产业风险、改善信用条件入手,采取系统性举措。首先,针对“销售难”问题,推动建立“龙头企业+农户”订单农业模式,通过签订保底收购协议稳定农户预期,并创新性地协调银行开发“订单质押贷款”,将未来收益权转化为有效抵押,破解小农户“有意愿、无资格”的信贷困境。同时,动员村“两委”成员先行试点,形成“先干起来”的示范效应。其

次,针对资金投入大和养殖风险高的制约,从组织层面结合制度环境,引导农户成立专业合作社,整合分散资源,同步引入政策性农业保险,并协调县区财政专项资金提供运营补贴与保费贴息,显著增强小农户抗风险能力。最后,针对返乡农户等特殊群体,推动构建村域信用信息共享平台,通过建立农户信用档案、完善信息评估机制,有效降低金融机构服务门槛,使更多小农户能够依托信用获得普惠金融支持。这些实践为小农户借助普惠金融参与产业发展提供了系统性支撑。

3. 深化发展期(2020年至今):产业融合与普惠金融协同赋能

2020年以来,狮头鹅产业步入品牌化与国际化拓展新阶段,但仍面临三方面挑战。驻村第一书记工作中发现:“S市C区缺乏育种、疫病防治等专业人才,部分农户沿用传统养殖方式,饲料配比不科学、防疫意识薄弱,鹅群存活率偏低”。同时,“狮头鹅产品以活禽销售为主,深加工开发滞后,品牌化程度低,附加值未能充分释放”。此外,“小农户有限能力制约其与外部市场有效衔接,参与积极性和主动性不足”。针对上述问题,驻村第一书记着力推动产业融合与普惠金融协同发展,一方面,他们主动对接高校及科研机构,引入专家团队开展育种、防疫和标准化生产技术指导,建立“科技特派员+示范户”帮扶机制,通过系统培训提升农户专业素养。另一方面,依托派出单位资源引进食品加工企业,共建研发平台,推动狮头鹅副产品开发与高值化利用,同时强化品牌建设,拓展高端销售渠道;此外,他们推动构建“龙头企业+合作社+小农户”协同发展模式,通过协议收购稳定农户收益,并协调金融机构创新“生物资产抵押”等普惠信贷产品,增强小农户参与普惠金融投身产业发展的意愿。

五、案例分析:“引领嵌入-多维赋能-融合协同”的运行机制

(一)从引领到互嵌:以培育产业发展激活小农户信贷需求

当前乡村产业发展中,小农户因外部产业基础薄弱、市场对接不畅,普遍表现出信贷需求不足。驻村第一书记通过“直接-间接-互嵌”三阶段策略,不仅破解了小农户信贷需求和产业发展困境,更创新性地推动普惠金融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

第一阶段为“自上而下”的直接嵌入,强化普惠金融服务供给。发展初期,驻村第一书记根据区域资源禀赋的特征来规划产业发展,因势利导为当地产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撑,同时为处于起步阶段的区域争取更多资源,助力当地弱质性涉农企业发展,例如交通基础设施、现代物流产业园、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等硬件设施的投入,需要由政府主导以弥补产业发展初期市场“缺位”,同时要持续完善普惠金融服务,破解小农户融资难题,通过精准“输血”以帮扶他们启动项目^[24]。

第二阶段为“自下而上”的间接嵌入,提升小农户金融参与意愿和能力。随着产业链条不断完善,驻村第一书记不再仅依赖于直接行政资源输入,而是转向发挥其社会资本和专业优势,精准联动企业、合作社、农户等多元主体,推动特色产业向内生驱动转型。在此过程中,驻村第一书记通过组织技术培训、完善合作社信用体系、强化订单农业模式,帮助农户提升市场适应能力和信用水平,为其参与普惠金融奠定坚实基础。更为关键的是,其以自身“纽带型”身份,协调金融机构开发符合小农户需求的金融产品,鼓励企业与农户签署保底订单和产销协议,形成“产业-金融-农户”三位一体的利益联结。此外,第一书记还积极推动村级信用信息平台建设,与金融机构共享农户生产、履约、还贷等数据,打破“信息孤岛”,降低金融服务门槛,提升贷款获批率。这种间接赋能,不仅有效避免了产业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和“输血式”发展弊端,还通过组织赋能和金融创新,激发了农户主动参与普惠金融的意愿和能力,助力其从“被动受益者”转向“产业与金融的主动参与者”,推动乡村产业与普惠金融实现双向良性循环^[37]。

第三阶段为融合发展与主体互嵌,打造产业链与金融链协同增效新格局。该阶段通过制度性联结和动态反馈机制,促进政府、龙头企业、小农户等主体在资源、知识、利益分配上形成双向依赖与共同演化,在已有基础上,重构主体间关系,使政府、企业、农户从“输血-受血”“引导-跟随”转

向“互融互促”。驻村第一书记担任“制度中介”的角色,通过协调不同主体间资源互嵌、知识互嵌、利益互嵌来整合双向资源、实现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促进乡村产业和普惠金融深度融合。首先,驻村第一书记推动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龙头企业可承担部分运营成本,农户以土地入股参与分红,形成“政府建园区-企业管运营-农户享收益”的共享模式,强化农户与企业之间的风险共担与收益共享。其次,驻村第一书记引入科研机构培育狮头鹅的现代农业技术和管理标准(如标准化生产流程),并将以传统狮头鹅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吸纳至企业产品开发中,形成具有S市C区特色文化基因的差异化竞争力,书记在推动资源与产业整合的同时,深度嵌入金融链条。最后,驻村第一书记作为市场补充监管者身份来推动“以强带弱”的涉农龙头企业组织链结小农户模式,从“订单农业”到“股权联结”演化迈进,不但拓宽了小农户的收入来源,而且减少了小农户收入的波动性,增强其还贷能力和参与金融机构服务意愿。

综上所述,驻村第一书记推动小农户有效参与普惠金融的机理与路径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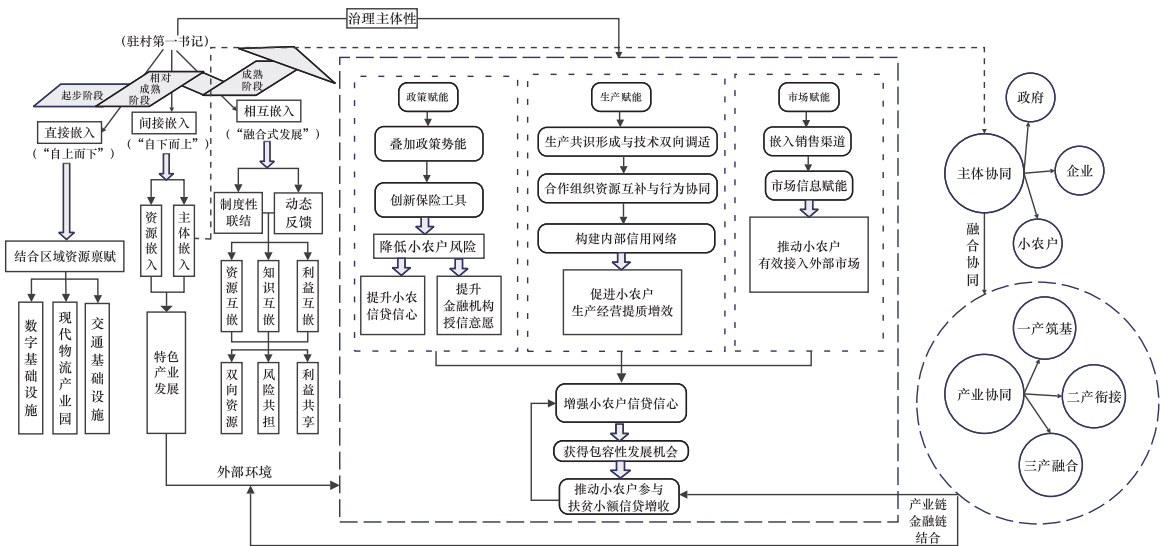


图2 驻村第一书记推动小农户有效参与普惠金融的运行机制

(二) 多维赋能:以主体嵌入赋能破解小农户信贷约束与市场困境的双重机制

传统村干部遵循“自上而下”的嵌入逻辑,即以政府设定的任务目标和配套资源为导向,单向度嵌入乡村场域。这种刚性嵌入模式因缺乏在地化反馈与动态调整机制,易导致政策执行与地方资源禀赋错配,难以精准适配小农户发展需求。相较传统村干部而言,驻村第一书记制度呈现出“自下而上”弹性嵌入的特征,在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框架下,第一书记充分发挥政治属性,以治理主体性通过政策、生产与市场,三重赋能小农户系统破解“有限能力-金融排斥-市场对接难”的瓶颈。

1. 政策赋能:跨层级纵向协同联动,争取多重政策资源支持

驻村第一书记通过“政策嵌入-资源整合-风险缓释”的协同路径,为小农户持续稳定参与狮头鹅产业提供了系统性支撑。他们依托特有的制度性身份和政治资本,展现出跨层级政策动员与多维度资源整合的突出能力,有效打通“乡-县-市-省”的多级行政体系,推动政策精准适配与资源有序下沉。此类赋能机制超越了传统乡村治理中以属地化管理为核心的运作逻辑,实现了纵向政策贯通与横向资源协同,在突破行政壁垒、实现纵向政策嫁接与跨系统资源引流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首先,在政策势能聚合方面,驻村第一书记通过跨层级嵌入机制,将地方产业精准向上对接到上层战略总纲,依托其跨层级的政治纽带优势,将地方特色产业精准嵌入省级发展规划、市级产业

发展规划和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纲要。例如,结合广东省“粤菜预制菜走出去”战略,推动S市出台《狮头鹅产业扶持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实现“乡-县-市-省”四级政策目标有机衔接,形成政策目标的纵向贯通与资源跨级下沉。此举既承接省级资源倾斜(如财政补贴、品牌推广等),又激活地方产业新动能,形成“上级战略牵引-地方政策适配”的赋能闭环,此类操作超出了传统村干部日常职能范围,体现了第一书记在政策设计前端介入并发挥资源聚合作用的核心优势。

其次,在风险治理与金融增信方面,传统村干部通常受限于政策执行,而驻村第一书记则展现出适应基层治理特殊要求的弹性能力。针对小农户风险承受能力薄弱的痛点,驻村第一书记推动政府明确风险分担机制(如信贷贴息、保险补贴等),主导设计“政策性保险组合包”,力图构建全产业链条风险对冲机制,将狮头鹅养殖纳入地方特色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提升至80%;与此同时,驻村第一书记引入“扶贫小额信贷保证保险”,捆绑大病医疗与意外伤害补充保险,通过“一张大保单”实现风险池扩容,使保险从“事后补偿”转向“事前干预”,降低金融机构服务成本与信贷风险,提升金融机构的授信意愿。

综上,驻村第一书记通过跨层级政治动员与制度整合,实现了从资源引流到制度建构的跃升,为小农户参与普惠金融提供了制度保障和风险应对基础。

2. 生产赋能:以资本下沉促资源释放,激发小农户生产内生动力

驻村第一书记破解小农户参与狮头鹅产业的内生性约束,通过“调适生产标准-构建风险对冲机制-创新合作组织”的三阶递进路径,充分发挥自身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优势下沉属地以赋能资源释放,有效激发小农户参与普惠金融投身狮头鹅产业发展的内生原动力。

首先,生产共识形成与技术双向调适。针对传统养殖与小农户新品种技术采纳之间的冲突,传统村干部在生产技术推广中多依赖经验传承和属地资源,往往受限于技术扩散能力和市场议价空间,难以统一生产标准,更缺乏跨界整合优势,驻村第一书记普遍掌握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知识结构,感知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术需求能力较强,凭借政策协调能力与资源链接优势,组织区域产业主体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制定《狮头鹅生态养殖技术规程》,明确饲料配比、疫病防控等标准^①,推动生产标准本地化和专业化,有效化解传统养殖与新技术之间的摩擦。同时,通过促成“企业保价收购协议”(承诺高于市价10%收购达标肉鹅),农户预期收益稳定性提升,新品种接受率从38%增至67%。

其次,合作组织资源互补与合作行为协同。一方面,针对农户“有劳力无资金”与“有资金缺劳力”的分化,驻村第一书记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强有力的组织动员能力)及跨部门组织的联结功能(跨部门对接政策性金融资源的能力),推动成立“狮头鹅联营合作社”来弥补二者分化:一是以劳动力入股。无资金农户以养殖工时折合股份(1个标准养殖周期=5%股权);二是以资金入股。有储蓄农户按5000元/股认购,享受保底分红+超额利润分成^②。该模式促使237户小农户参与合作社,劳动参与率提升41%。另一方面,驻村第一书记衔接“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基金”等普惠信贷金融产品,为合作社提供贷款担保(最高额度50万元),并创新“信贷-保险-订单”捆绑机制,农户申请贷款需签订标准化养殖协议并投保狮头鹅养殖险^③,此举将普惠信贷违约率得到有效控制,同时带动养殖规模的扩大,有效实现劳动力和资本的融合。

最后,构建内部信用网络。在信用建设和激励机制方面,驻村第一书记开展“示范户评选”,连

① 参见《C区年鉴2022》, http://www.chenghai.gov.cn/ch/zjch/chts/content/post_2240602.html。

② 参见《S市C区关于扶持狮头鹅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 http://www.chenghai.gov.cn/ch/zjch/chts/content/post_2240602.html;《C区年鉴2022》, http://www.chenghai.gov.cn/stchnycj/gkmlpt/content/2/2084/post_2084862.html#4099。

③ 参见《S市政策性地方特色险种——狮头鹅养殖保险实施方案》的通知, https://www.shantou.gov.cn/stsnyncj/gkmlpt/content/2/2187/post_2187865.html#3943。

续3年达标者成为“技术带头人”,享受贷款利率下浮20%的优惠,形成“能力-信用”正向循环,此机制推动普惠信贷申请率提升50%以上,融资成本下降18%,既增强了小农户参与普惠金融信贷的意愿,又切实降低了融资成本。

综上,驻村第一书记通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下沉,在生产标准推广、合作机制创新与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实现了对小农户的多维赋能,为小农户生产经营提质增效提供了机制保障,增强其参与普惠金融和投身产业发展的信心和能力。

3. 市场赋能:跨系统横向资源整合,提升小农户接入市场能力

驻村第一书记在推动小农户市场赋能过程中,依托其特有的制度性身份和跨层级部门的政治资本,展现出跨系统资源整合与跨层级政治动员的显著优势。通过构建“渠道重构-信息共享-能力跃升”的协同路径,有效破解了小农户长期面临的“市场接入难、议价能力弱、产品溢价低”等结构性困境,并将市场优势转化为提升农户金融信用与融资的能力。这种赋能机制实现了跨区域、跨系统的市场资源对接与制度协同,从而在渠道嵌入、信息透明与品牌认证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实践效果。

首先,嵌入销售渠道,从分散化向体系化衔接。驻村第一书记依托其政治资本与跨系统协调能力,推动狮头鹅合作社与盒马鲜生等平台签订直供协议,构建“基地-冷链-商超”短链体系^①,线上销售占比从12%跃升至35%,流通效率的提升降低了滞销风险。此外,对接粤菜龙头企业(如广州酒家),将狮头鹅纳入预制菜原料目录,签订“保底收购+利润分成”协议,收购价提高超过二成,违约率降至3%以下。通过稳定订单增强农户还款能力,扶贫小额信贷申请率提升了近三成。

其次,市场信息赋能,破解“信息孤岛”困局。驻村第一书记主导推动开发“鹅管家”产业信息平台,集成价格、物流等实时数据,动态匹配供需,促使辖区农户决策响应速度大幅度提升,减少价格波动损失。信息透明化降低金融机构尽调成本,缩短信贷审批周期。此外,驻村第一书记推动管理部门、行业协会联合制定《狮头鹅交易管理办法》,强制公开品质分级标准,区块链技术固化交易记录,欺诈投诉率下降超八成。交易可信度提升,推动“信贷+订单”捆绑模式,农户获贷率提高至68%。

最后,提升市场能力,驱动品牌赋能与“圳品”认证。驻村第一书记通过政策动员与跨层级申报,推动“C区狮头鹅”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②,打造“非遗+生态”品牌体系,提高产品溢价率,品牌高端市场份额占近五成。品牌资产属性逐渐显现,金融机构基于此开发了狮头鹅产品“地理标志质押贷款”。驻村第一书记带头推进执行《圳品·肉鹅养殖规范》,2023年S市C区成为首个被列入禽类的“圳品”,并顺利进驻山姆会员店等高端零售渠道,粤港澳大湾区市场占比份额大幅提高。驻村第一书记通过推进数智化赋能狮头鹅产业,致力于标准化生产的同时,不断完善农户信用评级制度,以产业为导向的普惠信贷覆盖率持续扩大。

综上,驻村第一书记通过跨系统市场资源整合、数字化治理工具与品牌制度赋能,不仅在渠道、信息和品牌三个维度实现了对小农户介入市场能力的有效提升,也通过建立“订单-信息-信用”的良性循环增强了其普惠金融可获得性。

(三) 融合协同:以整体融合拓展推动产业链与金融链互融互促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传统狮头鹅产业发展面临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等现实困境。驻村第一书记通过党建引领与资源整合双重机制,构建“一产筑基、二产衔接、三产融

^① 参见《S市C区狮头鹅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2023—2027年)》, http://www.chenghai.gov.cn/stchnycj/gkmlpt/content/2/2306/post_2306278.html#4099。

^② 参见《关于印发首批广东省地理标志培育产品名单的通知》, http://www.chenghai.gov.cn/stchscgj/gkmlpt/content/2/2296/post_2296971.html#4511。

合”的产业协同发展模式,在标准化生产、精深加工与三产融合过程中,有效破解了传统农业产业发展的结构性瓶颈,促进了产业升级与金融供给的良性互动,将小农户生产与普惠金融服务有机衔接起来,系统破解了小农户“融资难、参与弱”的结构性瓶颈,有效提升了其普惠金融的可及性。

1. 运行机制:党建引领促资源整合的系统性协同

驻村第一书记充分发挥党组织在乡村产业振兴中的核心引领与统筹协调作用,通过“党建统筹-资源整合-机制协同”三位一体的模式,有效推动产业链与金融链的深度融合。一方面,依托功能型党组织和产业联合党委等组织创新,跨部门、跨层级整合政策、技术、资金与市场资源,打通土地审批、环保监管、金融供给等环节的制度堵点,为产业链延伸和金融嵌入提供了制度化保障。另一方面,驻村第一书记积极引入高校科研机构、金融机构与龙头企业等多元主体,构建“政-产-学-研-金”协同赋能体系。通过这种机制,推动技术创新、标准制定、园区建设与数字化改造,为后续普惠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提供了产业基础和数据支撑。

2. 融合路径:多环节推动产业链与金融链深度融合

(1) 打牢一产根基,标准化生产激活金融需求。驻村第一书记以党组织统筹能力推动第一产业提质升级,夯实三产融合的源头基础。通过成立“种质资源保护党小组”,联合高校科研机构建立狮头鹅原种保护基地,制定《狮头鹅种鹅选育技术规范》,将传统养殖升级为标准化种源产业。在此过程中,创新“生物资产抵押”模式,农户持有的种鹅群经第三方评估后可按评估值 60% 抵押贷款。2023 年 C 区发放种鹅抵押贷款 4300 万元,带动种鹅存栏量增长 67%。同时,推动“党支部+生态养殖示范区”建设,整合零散养殖单元为标准化基地,统一配套自动饲喂、疫病监测等设施,形成固定资产池作为集体抵押物,成功撬动“智慧养殖贷”等产品,提升农户设备融资覆盖率。

(2) 强化二产衔接,精深加工延伸金融供给场景。针对第二产业薄弱环节,驻村第一书记构建“党建联建-集群培育-金融创新”的产业增值体系。在镇域层面成立“产业联合党委”,统筹协调土地、环保、金融等部门,规划建设狮头鹅精深加工产业园。通过党员技术骨干驻企帮扶,推动传统作坊升级为现代化加工车间,开发鹅肉预制菜、生物制剂等 23 种衍生产品。在此过程中,金融机构基于加工环节特性创新金融工具:一是针对原料收购季节性资金需求,开发“订单仓单组合贷”,允许企业以收购订单和原料仓单双重质押融资;二是针对设备升级需求,设计“技改专项贷”,执行较基准利率下浮 20% 的优惠政策。2023 年狮头鹅产业加工环节贷款余额达 2.1 亿元,带动产品附加值提升。

(3) 拓展三产融合,一二三产融合创新金融服务。驻村第一书记通过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推动第三产业与一二产深度融合,创造信贷需求新增长点。在流通领域,组建“电商物流功能型党支部”,整合冷链物流企业、电商平台与合作社资源,构建“产地预冷-干线运输-销地仓储”一体化体系。金融机构据此创新“物流金融”产品,农户可凭冷链仓单申请“在途货物质押贷款”,融资成本下降近 2%。在文旅领域,挖掘狮头鹅非遗文化价值,打造“养殖体验+非遗工坊+美食旅游”融合业态,开发“文旅收益权质押贷款”,农户以预期门票收入作为还款来源,文旅项目带动农户户均增收达 2.3 万余元。在科技服务领域,建立“党员科技特派员”制度,将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嵌入全产业链,形成“数字资产-金融信用”转化通道,农户生产数据经脱敏处理后可作为增信依据,数据达标者授信额度提升近三成。

3. 实施成效:产业赋能与金融普惠融合式发展

通过党建引领下的三产融合与金融创新,C 区狮头鹅产业实现了规模化、标准化、高值化发展,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适用性与可持续性显著增强。截至 2023 年,C 区狮头鹅产业相关贷款规模突破 3 亿元,其中种鹅抵押贷款、加工环节贷款和三产创新类贷款均呈快速增长态势。产业融合与金融嵌入的协同发展,不仅推动了种鹅存栏量增长 67%、产品附加值提高约 35%,还通过冷链质押、文旅收益权质押、数据增信等创新方式有效降低了农户融资成本,平均贷款利率下降近 2%,授

信额度提高30%,参与产业链融合的农户户均增收2.3万元,形成了“产业升级-金融适配-农户增收”的正向循环,为小农户深度参与普惠金融提供了系统化实践模式。

六、结论与讨论

(一) 结论与启示

基于能力贫困与嵌入性理论,本文通过对粤东S市C区驻村第一书记赋能小农户参与普惠金融的实践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产业嵌入的阶段性协同机制是破解小农户信贷需求抑制的关键。驻村第一书记通过“直接-间接-互嵌”三阶段策略,动态适配乡村特色产业发展需求,为小农户参与普惠金融奠定了外部产业基础;第二,多维赋能机制显著缓解了小农户的能力贫困约束。通过政策赋能、生产赋能与市场赋能的协同作用,系统提升了小农户的信贷信心与市场参与能力;第三,利益联结创新是普惠金融可持续性的重要保障。驻村第一书记通过“以强带弱”的组织化机制(如订单农业、股权联结)与信用网络建设,将小农户纳入现代化产业链。这种“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联结机制,不仅降低金融机构服务成本,还通过信用资本积累形成“能力-信用”正反馈,推动小农户从“被动受惠”向“主动参与”转变。基于研究结论,得出以下启示:

第一,强化金融工具创新,完善普惠金融政策体系。建议以差异化、精准化为导向,完善政策性保险和商业保险机制,扩大风险覆盖范围;推动大数据技术在信贷全流程的应用,构建“生产数据-信用画像-智能授信”的转化通道;持续开发适配农户需求的金融产品,如生物资产抵押、地理标志质押等创新工具,激发农户的信贷需求。

第二,优化驻村第一书记制度,提升资源整合效能。应进一步完善选拔、培训与考核机制,注重积累基层经验和数字素养;通过数字化工具支持产业需求监测与金融资源对接;将产业链与金融链融合成效纳入考核体系,强化其在乡村产业发展中的纽带作用。

第三,发挥基层党建引领作用,促进产业与金融深度融合。一方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框架;另一方面,依托党建整合产业链数据,引导开发定向供应链金融产品,实现产业增值与金融创新的良性互动。

(二) 进一步讨论

第一,本文重点揭示了驻村第一书记如何运用其独特的跨层级政治资本与资源整合能力激活普惠金融、赋能小农户的内在机制,但其相较于传统村干部的差异化尚待系统比较,这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深化空间。

第二,本研究基于特色产业案例,发现驻村第一书记在高附加值产业中通过资源整合可实现显著赋能。然而,对于水稻、小麦等关系粮食安全的大宗农产品,其产业特性与普惠金融依赖路径可能存在差异,未来需通过多案例比较,进一步探究不同产业类型下驻村第一书记的赋能路径与成效边界。

第三,尽管单案例研究有助于深入剖析政策资源、村级治理与农户行为间的互动关系,但在推论层面存在局限。研究结论对于大宗农产品主导型村庄、不同区域经济背景下的适用性,仍有待通过多案例比较与定量实证方法进行检验。

第四,本研究观察到驻村第一书记在优化利益联结机制方面的积极作用,但龙头企业与小农户间的议价能力差异仍是长期挑战。未来需进一步探索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小农户权益保障机制。

参考文献:

- [1]张珩,张洋. 做好普惠金融大文章的理论内涵、时代挑战与突破路径[J]. 财经问题研究, 2025(1): 29-42.
- [2]曹光乔, 吴萍. 如何把小农户“服务好”“带动好”——基于农机社会化服务视角[J]. 农业经济问题, 2023(10): 22-31.

- [3] 韦幸, 蓝滨. 广西“户贷企用”扶贫小额信贷业务退出问题研究[J]. 广西经济, 2019(1):42-45.
- [4] 陈思, 聂凤英, 罗尔呷, 等. 正规借贷、非正规借贷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来自中国西部贫困地区的经验证据[J]. 农业技术经济, 2021(5):35-47.
- [5] 刘西川, 黄祖辉, 程恩江. 小额信贷的目标上移:现象描述与理论解释——基于三省(区)小额信贷项目区的农户调查[J]. 中国农村经济, 2007(8):23-34.
- [6] 黄祖辉, 刘西川, 程恩江. 贫困地区农户正规信贷市场低参与程度的经验解释[J]. 经济研究, 2009(4):116-128.
- [7] 殷浩栋, 汪三贵, 王彩玲. 农户非正规金融信贷与正规金融信贷的替代效应——基于资本禀赋和交易成本的再审视[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7(9):64-73.
- [8] 韦幸, 蓝滨. “户贷企用”扶贫小额信贷退出难[J]. 中国金融, 2019(6):104.
- [9] 张龙耀, 李欣蕾. 小额信贷能触及低收入群体吗? [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24(12):45-63.
- [10] 熊健, 杨军. 数字化背景下的农村金融排斥:数字机遇还是数字鸿沟[J]. 农业技术经济, 2023(12):111-122.
- [11] 温涛, 陈一明. 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经济融合发展:实践模式、现实障碍与突破路径[J]. 农业经济问题, 2020(7):118-129.
- [12] 陈思, 罗尔呷, 聂凤英. 正规借贷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作用路径——基于西部贫困地区710户农户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江汉论坛, 2020(12):34-44.
- [13] 罗玲, 吴本健, 牛林漪. 新时期小额信贷与相对贫困治理:理论逻辑与案例证据[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1):41-55.
- [14] 伍再华, 叶菁菁, 郭新华. 收入不平等、社会保障支出与家庭借贷行为——基于CFPS数据的经验分析[J]. 财经科学, 2017(12):55-68.
- [15] 聂召英, 王伊欢. 链接与断裂:小农户与互联网市场衔接机制研究——以农村电商的生产经营实践为例[J]. 农业经济问题, 2021(1):132-143.
- [16] 吴重庆, 张慧鹏. 小农与乡村振兴——现代农业产业分工体系中小农户的结构性困境与出路[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1):13-24.
- [17] 姜长云.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若干重大战略问题探讨[J]. 经济纵横, 2019(1):10-18.
- [18] 褚保金, 卢亚娟, 张龙耀. 信贷配给下农户借贷的福利效果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09(6):51-61.
- [19] 张乐柱, 许兰壮, 伍茜蓉. 正规信贷约束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异质性研究[J]. 经济与管理评论, 2022(5):63-71.
- [20] 于赞, 秦冠宇, 李韬. 金融帮扶政策与低收入农户的收入效应[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3):56-72.
- [21] 温涛, 何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创新:逻辑转换、难点突破与路径选择[J]. 中国农村经济, 2023(1):93-114.
- [22] 程名望, 史清华, JIN YANHONG, 等. 市场化、政治身份及其收入效应——来自中国农户的证据[J]. 管理世界, 2016(3):46-59.
- [23] 刘冬文, 苗哲瑜, 周月书. 数字化“金融+产业”模式: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的机理与案例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 2023(9):96-109.
- [24] 刘西川, 杨梦瑶. 风险保障金与合作金融组织剩余控制权动态配置——基于SY资金互助社的案例研究[J]. 管理世界, 2024(7):157-174.
- [25] 章文光, 廖冰武, 申慕蓉.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小额信贷的普惠化路径探索——基于多案例比较分析[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2(2):89-99.
- [26] 丁辉侠, 胡婷婷. 驻村第一书记公共服务动机何以形成? ——一个制度激励框架下的分析[J]. 治理现代化研究, 2023(6):50-58.
- [27] 冯嘉馨, 程美东. 脱贫攻坚中第一书记制度的实践困境及改进[J]. 北京社会科学, 2022(5):118-128.
- [28] 马克·格兰诺维特(美). 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 罗家德, 等, 译[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24-27.
- [29] 苏毅清, 张诗斐. 驻村第一书记促进乡村内生发展的社会资本逻辑——基于广西大水村的个案研究[J]. 公共管理学报, 2025(1):139-150.
- [30] 王同昌. 第一书记引领村级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行动路径[J]. 中州学刊, 2023(3):20-26.

- [31] BOURDIEU P. The forms of capital[M].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6:248-253.
- [32] 张龙耀,徐曼曼,刘俊杰. 自然灾害冲击与农户信贷获得水平——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J]. 中国农村经济, 2019(3):36-52.
- [33] 柏培文,张云. 数字经济、人口红利下降与中低技能劳动者权益[J]. 经济研究, 2021(5):91-108.
- [34] 王亚华,宦梅丽. 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民集体行动与农村公共治理[J]. 广东社会科学, 2023(2):15-26.
- [35] 罗伯特·K. 殷. 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原书第5版),周海涛,史少杰,译[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7:33-84.
- [36] EISENHARDT K M. 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9(4):532-550.
- [37] 苏毅清,邱亚彪,方平. “外部激活+内部重塑”下的公共事物供给:关于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机制解释[J]. 中国农村观察, 2023(2):72-89.

Mechanism and Path of Empowering Small Farmers to Effectively Participate in Inclusive Finance by the First Resident Secretary

CHEN Si^a, YANG Xue-ru^b

(a.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Information; b.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Abstract: Inclusive finance is a critical pillar for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However, due to weak industrial foundations and insufficient endogenous capacity, smallholder farmers have long faced challenges of credit self-exclusion. Drawing on the theory of capability poverty and embeddedness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tegrated "Embedding-Empowerment-Synergy" analytical framework. Using the practices of Resident First Secretaries in District C, City S, Eastern Guangdong as a case study, it systematically elucidates the mechanisms and pathways through which they empower smallholders to integrate into inclusive finance. The research finds: First, a phased synergy mechanism is constructed. Through a staged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of "directly embedding policy resources-indirectly building a symbiotic network of entities-mutually embedding the integration of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the Resident First Secretaries dynamically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distinctive rural industries, thereby addressing the suppression of credit demand among smallholders. Second, multi-dimensional empowerment pathways are optimized. By leveraging policy tools, standardizing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and digitalizing market channels, they systematically remediate the capability deficits of smallholders and reshape their confidence and behavioral logic regarding credit participation. Third, innovative organizational interest-linking mechanisms are developed. Centered on "risk sharing and credit accumulation", these mechanisms foster innovation in financial instrument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ial chains. This promotes a shift among smallholders from passive beneficiaries to active participants, enabling their effective engagement in inclusive finance. The paper proposes: refining the design of adaptable inclusive finance policies and strengthening financial instrument innovation; optimizing the selection and assessment mechanisms for Resident First Secretaries to enhance their capabilities in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digital governance; and reinforcing the guiding role of Party building to promote holistic integration and facilitate the convergent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hains and financial chains.

Key Words: inclusive finance; first secretary in the village; embedded governance; ability poverty; interest connection

【责任编辑:杜晓艺】